

史学新论

张九龄对盛唐儒学的承继与超越

刘占召

【提要】唐代儒学处于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之间的过渡阶段，从制礼作乐以缘饰盛世到探讨德行修养以挽救世道人心，盛、中唐儒学出现了这一由外向内的转变，体现出汉、宋儒学发展的趋势。张九龄一方面与张说宣扬符命祥瑞，通过制礼作乐来润色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汉代儒学的精义，另一方面又自觉践履儒家的德行操守，不仅开启了儒学发展的新命题，而且通过树立儒家的人格典范，对唐代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德行 儒术 礼乐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1-0126-05

张九龄是盛唐名相，他被张说引为同调，二人前后相继，奖掖后进，培育了大批新型的“文儒”士人群体，对盛唐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张九龄不仅在政治、文学方面成就卓著，他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虽然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但其思想的主流还是儒学。唐代儒学处于汉代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阶段，张九龄的儒学思想体现出过渡阶段的某些特征，前人对此少有论及，研究这一问题，对深化唐代儒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考古义以断时政：张九龄对盛唐礼乐制度建设的思考

唐代儒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初盛唐儒学主要是礼仪制度的建设，大体以《开元礼》的修成为完成的标志；后一个阶段则以中唐时期韩愈及其弟子们的活动为标志，儒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内心修养。

初唐时期的孔颖达在系统总结汉代以来经学思想的基础上，完成了《五经正义》，统一了儒学内部各派的纷争，为士人的科举考试、立身处世提供了一个标准的经典文本和权威的思想依据，

儒家今文、古文之争，各家宗派师说之争，南学、北学之争以及郑学、王学之争均成为历史。皮锡瑞《经学历史》称：“自《经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经学失去了反对的声音和批评的话语，只是作为应付考试而背诵、记忆的知识，这样思想界必然渐趋于僵化和平庸。^①

盛唐儒学依旧沿着汉代儒学的传统，其中中心内容是用制礼作乐来缘饰政治，营造盛世的气象，所以这一时期的礼学特别兴盛。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0认为：“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盛唐儒学所遵循的治学风气，也还是汉儒以来的名物训诂之学。以琐碎的章句训诂的方式，通过对于礼法典章的求证，探求维持统治秩序之理，是初盛唐儒学的重要任务，所以此时的儒学

① 刘知几(661~721)《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刘知几依据《山海经》、《竹书纪年》等文献在《史通》外篇的《疑古》、《惑经》中大胆怀疑《尚书》、《春秋》中对尧、舜、禹的“禅让”及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等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体现出严肃的批判精神和非凡的胆识，引起唐宋以来学者的广泛讨论。不过刘氏的学说只是当时的“异端”，并非思想界的主流。

在制度和礼仪的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编制了《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完善了孔庙的修建、祭祀和配享、从祀制度，制定《唐律疏议》，使儒教的法律也臻于完备。

张说是盛唐儒学的代表人物，玄宗在《命张说兼中书令制》中称赞他“当朝师表，一代词宗”。张说所倡导的儒学“志在粉饰盛时”，他先后主持编撰了《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大唐乐》、《唐文府》、《初学记》等典籍；设集贤院，聚文学之士修书侍讲；主持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如祭祀后土，亲祀南郊，封禅泰山；制定封禅礼仪，修订“五礼”；颁布新的历法《开元大衍历》等。封禅泰山是盛唐最壮观的典礼，也是张说制定礼乐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张说《大唐封祀坛颂》认为：“封禅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为也。”受封禅的帝王必须位当五行图策之序、时会四海升平之运、德具钦明文思之美。张说的封禅理论包含着浓厚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思想，他企图以此为圣明之君和太平盛世涂上一层神秘而神圣的色彩。张说“动有礼乐之运，言有雅颂之声”，适应了唐玄宗好大喜功的心态，为开元盛世绘制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景象，正如《新唐书》卷126《张说传》所论：“开元文物彬彬，（张）说力居多。”

张九龄对张说以礼乐粉饰升平的历史功绩有过热情的赞扬，他在《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中说：“及夫先圣微旨，稽古未传，缺文必补，坠礼咸甄，以经籍为笙簧，于朝廷为粉泽，固不可详而载也。”不过，张九龄对盛唐礼乐制度的思考，要比张说更有深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张九龄称道符命祥瑞，重视礼乐典章的建设，但他更强调礼乐制度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和伦理精神。张九龄也有时通过称道符命祥瑞的灵异，为唐玄宗应运称帝寻找神秘的理论依据，如他在《洪州进白鹿表》援引汉代的讖纬之书《瑞应图》和《孝经援神契》来论证白鹿是难得的祥瑞。他也热衷于从事各种祭祀典礼，认为这些“圣朝典则，盛世仪文”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他非常推崇“衣冠华夏，礼乐家邦”的大国形象，认为帝王的典礼祭祀不仅是答升平、告成功的表现形式，也是为了给苍生祈福，如其《后土赦书》批评周、汉帝王的祭祀，都是为了满足帝王个人

的私欲，而玄宗的祭祀却是为了社稷苍生；而在《东封赦书》中，他认为帝王的祭祀活动，还有代民受过的意义。总之，张九龄一方面重视典礼祭祀对粉饰太平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更强调典礼背后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伦理精神。正是因为如此，张九龄特别强调依据人情以及现实的需要来变革礼法，反对拘泥于礼制的繁琐仪式，《籍田赦书》：“礼经沿革，必本人情。”《敕制十道使》：“周汉以还，事有因革。帝王之制，义在随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0称赞其“考古义以断时政，务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

其次，张九龄具有天人感应的思想，经常探讨灾异产生的原因，不过，他的目的不是称道灾应的神奇，而是强调在位者通过仁政爱民之心来消弭百姓的灾难。《贺雪状》：“陛下黎庶在念，忧济常深。圣心精诚，天意昭感。孰云玄远？不日有应。”另外，《贺祈雨有应状》、《贺太阳不亏状》、《贺雨晴状》等均通过强调人事的努力，弱化天命对人事的影响。其《上封事书》云：“臣闻乖政之气，发为水旱。天道虽远，其应甚速。……今六合之间，元元之众，莫不悬命于县令，宅生于刺史。……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岂惟孝妇一事而已！”张九龄把天旱成灾的原因，归结为刺史、县令的失职，从而引伸出一篇整顿吏治的文章。

二、张九龄的儒者品格对盛唐文儒的影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中，曾对玄宗朝的各个宰相进行过综合的评价，他评价张说是“尚文”，评价张九龄是“尚直”，这个结论非常中肯。张说的儒学思想主要在沿袭汉儒之学，他注重制礼作乐修饰政治的功能，至于儒学在个人操守方面的意义，他很少关注。张说趋炎附势，收受贿赂，甚至卖官鬻爵。张九龄虽然和张说一样喜欢谈论祥瑞符命、天人感应以及礼乐制度，但他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在个人操守方面的践履意义。由礼乐之学转向内在德行的修养，是盛、中唐儒学嬗变的趋势。张九龄的这一思想，不仅顺应了儒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并通过所树立的突出的人格形象，对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张九龄非常讲究德行操守，他直道而行，胸怀坦荡，具有忠君爱国、勤政爱民的儒者风

范。其《在郡秋怀二首》中称“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张九龄刚直不阿，多次匡正唐玄宗的弊政，《新唐书》卷126《张九龄传》记载，“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武惠妃谋陷太子，并以久居相位来拉拢他，张九龄大义凛然地予以回绝。他以社稷为念，反对玄宗废太子；他洞察到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上疏请诛杀之；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他在《奏劾李林甫》中劝诫唐玄宗不可以李林甫为相，否则“异日为社稷忧”；次年，唐玄宗大寿，群臣大献珍宝，张九龄却上《千秋金鉴录》论千古兴亡之道，并劝戒玄宗对“小人恒态，不可不察”，“祸生有胎，不可不忽”。张九龄刚直不阿、铁骨铮铮，大有谔谔之士的风度，唐玄宗曾在《罢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为尚书左右丞相制》中称赞他“直道之心弥固，谔谔之操愈坚”，张九龄守正嫉恶，以道匡弼，堪称开元贤相。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2对张九龄的品格有过高度的赞誉，认为其“生于教衰行薄之日”，但能做到“清节不染于浊流，高蹈不伤于钳网”，堪称“一代泰山乔岳之风标”。

其次，张九龄坚持以德望、名节培养士人、选拔官吏，对盛唐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开创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但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完善，考核的方法及录取的标准还处于不断变革中。初唐以来确定了诗赋取士的原则，文章成为取士的首要标准，这引起了许多士人的非议，他们批评诗赋取士不能测试应试者的学识、吏干和德行，《旧唐书》卷190《王勃传》记载，吏部侍郎裴行俭批评王勃等人缺乏“器识”，“浮躁浅露”，非“享爵禄之器”。《旧唐书》卷101《薛登传》中，薛登也批评士人“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背离汉代选举砥砺德行的传统。针对科举考试不能有效地督促士人的节操问题，张九龄提出了改革吏治、整顿士风的许多措施。在《上姚令公书》中，他反对“溺在缘情之举”，“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的干谒风气，请求宰相姚崇“远谄躁，进纯厚。”张九龄很重视官员的操守，据《大唐新语》卷3《公直》记载，张九龄主张：“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勋旧次之。”其担任宰相后，“所推引皆正人”。

张九龄以德行节操培养士人、选拔官吏，他自己也自励名节，坚守儒士品格，为文士树立了儒者

的谔谔风范。在盛唐政坛上，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的盛唐文儒派和以李林甫、杨国忠为代表的吏能派水火不容，史家称之为“文学、吏能之争”。“文学、吏能之争”一方面表现为操守品节上的邪正之分，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他们对才学观念和用人标准的不同认识。据毛汉光先生研究，中古时期的才学观念和选官标准主要有四项：德行、经术、文章、吏干。^①这些才学标准处于不断的分合变化中，直到宋代出现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批兼擅文章、经术与吏干的综合型官僚，“吏治”、“文章”、“经术”之类的传统分野才趋于消亡。^②唐代的历次党政，和才学观念的分歧有关，正如汪篋先生所说：“玄宗时的封建政权内部的斗争……都与用人标准有关。其后代宗时的常袞对杨绾、崔祐甫的斗争，也是如此。张说、张九龄、常袞等摈斥不以文词进身的人。姚崇、萧嵩、李林甫、崔祐甫等人或主张以吏治才能为用人标准，或主张以经学德行为用人标准。”^③这一意见，是有道理的。

吏干、文学这两种才学标准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钱穆先生认为：“唐代士人，一面在北朝吏治与南朝文学的两种风气转换之下徘徊，一面则在贵族门第与白衣庶族的两种势力消长之下鼓荡。”^④可以说，辞章是南朝重视文学风气的延续，而吏干则是唐代沿袭了北朝以来的价值观念。北朝特别是北周、杨隋以来，非常重视吏治。周隋集团是一个依赖高度鲜卑化方针崛起的尚武的军功集团，在文化上远不能与山东及江左士族抗衡，他们反对以文学、经术为标准的选官方式。阎步克先生认为：“在周隋之军功官僚集团看来，文学不仅与其素质不合，而且与其关注的吏治武功与吏能选拔无干。”^⑤唐承隋制，盛唐时期吏干派代表宇文融、牛

① 毛汉光：《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任官标准之观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3分，第333页。

② 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③ 汪篋：《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④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82页。

⑤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仙客、李林甫等，多沿袭周隋集团以来的风气。

盛唐文儒派和吏能派之间围绕着任官标准展开了政争。文儒以文章和儒学为才学，轻视吏干；吏能派以吏干为才学，轻视辞学。如孙逖《唐齐州刺史裴公德政颂》云：“方当弥纶帝绩，岂徒润色吏事而已。”据《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记载，吏能派的代表李林甫则声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他们以雕虫小道为借口，排斥文学出身的大臣。正如张九龄在《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中所言“时多吏议，摈落文人”，“庸引雕虫，沮我胜气”。开元二十九年张九龄罢相后，吏能派控制朝政。和文儒派相比，他们不学无术，严格遵守律令格式，法苛刑酷，聚敛奢侈。《太平御览》卷205《职官部·丞相下》记载，“牛仙客既居相位，……百司或有所谘决，辄对曰：但依令式即可，若不依文，非所知也。”李林甫曾主持编撰过一系列法典，素谙律令格式，《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称他“自处台衡，动徇格令”，《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称：“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他们并不注重以名节培育士人，科举取士贿赂公行，文学贤能之士失去正常的仕进途径。《旧唐书》卷111《高适传》称“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对此感慨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记载，张九龄贬官后，“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不过，张九龄培养的盛唐文儒与吏能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受张九龄的影响，天宝之后的文儒阶层不再张皇礼乐，纷纷自觉地砥砺德行，以名节相高。如萧颖士、李华等坚守儒道，穷居著述，和李林甫、杨国忠集团继续进行斗争。

据《新唐书》卷202《萧颖士传》记载：“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土方丧父，不诣。林甫尝至故人舍邀颖士，颖士前往，哭门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吊乃去。怒其不下己，调广陵参军事。”萧颖士在天宝八载，作《伐樱桃树赋》以“体异修直，材非栋干”却植于紫极宫前的樱桃树，讽刺无才德而在位的李林甫。《旧唐书》卷190《李华传》记载李华迁监察御使，“宰相杨国忠支姪所在横猾，华出使，劾按不桡，州县肃然。为权幸见疾，徙右补阙。”《新唐书》卷128《颜真卿传》

记载，颜真卿也因为刚直敢言，得罪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贾至在天宝初年作《旌儒庙碑》赞扬儒生不畏强权、独立直行的品格，是对吏能派强权政治的有力回应。

总之，张九龄的直道精神，表现出刚正不阿，铁骨铮铮处世原则，对唐玄宗的弊政多所匡正，树立了“开元贤相”的形象；另一方面他坚持以德望、名节培养士人、选拔官吏，对变革势利浮薄的士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九龄风度”的思想史意义

张九龄以浩然正气和刚正不阿的儒者品格，对盛唐士风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22称赞他：“唐多才臣，而清贞者不少概见，贞观虽称多士，未有与焉。其后如陆贽、杜黄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于没世，而宁静淡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而开元之世的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不然，则议论虽黠，法制虽详，而永徽以后，奢淫贪纵之风，不能革也。”

张九龄的忠君思想和儒者风范，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自魏晋以来，士人不关注儒家思想对个人操守的践履意义，其价值观念多由社会转向个体，把家族私利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高，所谓“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以不“事事”为高，行默默之政，这种风气在唐代依然存在。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0“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论”条指出：“自六朝以来，君臣之大义不明，其视贪生利己、背国亡君已为常事。有唐虽统一区宇已百余年，而见闻习尚，犹未尽改。”张九龄有强烈的忠君思想，其《敕处分十道朝集使》称“在官当先为国，理人各扬其职。不当冒荣干进，苟利其身。”他认为官员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贪图一己私利，甚至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还有奋不顾身、杀身为国的殉道精神，其《白羽扇赋并序》称“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忘！”与以往的思想界相比，张九龄的忠君思想，显示出思想革新的意义。

如果把张九龄放在盛中唐之际的思想现状中来观察，张九龄儒者风范的意义将更加清晰。中唐士人在反思安禄山之变时，大多以为天宝之后士人贪图私利、士风浮薄是造成战乱的根源，李

华在《杨骑曹集序》中称：“开元、天宝之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是以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体道者寡矣。”李华认为张九龄罢相之后，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当权是造成士风浇薄、战乱不休的重要原因。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记载，贾至称：“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李德裕《荐处士李源表》称：“自天宝之后，俗尚浮华，士罕仗义，人怀苟免，至有弃城郭委符节者，其身不以为耻，当代不以为非。”总之，天宝时期的士人为个人私利而出仕，因此只知道贪图个人的富贵，置国家的存亡于不顾。

张九龄的忠君思想和儒者风范不仅影响盛唐的文儒，对中唐士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张九龄死后，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高度赞扬张九龄“直气颀词，有死无二；彰善瘅恶，见义不回”。《旧唐书》卷159《崔群传》记载，中唐士人崔群说：“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之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中唐士人吕温在《张荆州画像赞序》中称赞道：“以生人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无所避，秉大节而不可夺，小必谏，大必诤。攀帝槛，历天阶，犯雷霆之威，不霁不止，……举为时害，动拂上欲，日与谗党抗行于交戟之中。”可见，中

唐的士人不仅把张九龄罢相作为盛中唐治乱之分的标志，而且，他们对张九龄的忠君思想和儒者风范推崇备至，可谓是一脉相传。中唐儒学由盛唐的礼乐之学转为内在的德行践履之学，张九龄以名节自励，可谓开其先河。

台湾学者陈弱水先生认为，杜甫坚守忠君思想和儒者品格，相对于中古以来士人三教并重的思想格局而言，这是一个突破，属于一个重大思潮变化的开端。^①其实，作为开元贤相的张九龄，他的忠君思想和直道精神同样也突破了三教并重的思想格局，也可以看作是儒学复兴的一个开端。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史通》文献整理及其批评史研究”（12CZW054）、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门第、才学之争与中唐文学（09YJC751011）”、江苏省教育厅项目“中唐价值观念的转型与文学革新研究”（2011SJD750001）、东南大学人文社科创新基金项目“《史通》批评史研究”（SKCX10010）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俊

① 陈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1分，第30页。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Jiuling and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s Confucianism

Liu Zhanzhao

Abstract: Tang Dynasty's Confucianism was in a transitional stage between the Han Dynasty's Confucianism and Song-Ming's Neo-Confucianism. Through the inside-out change of Tang Dynasty's Confucianism which was changed from creating rituals and music in order to varnish over the prosperity to discussing morality with an aim to get salvation, we can see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Han-Song's Confucianism. On one hand, Zhang Jiuling advocated the symptom of emperor received through the creating of rituals and music to embroidery emperor's contribution, which played Han Dynasty's Confucianism essence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he pursued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consciously. It not only opened the new pro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duce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scholars of Tang Dynasty by establishing a glorious personality model.

Keywords: virtue; Confucianism; rituals and music